

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第一辑)

童岭主编

Tangdai Binli Yanjiu

唐代宾礼研究

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

王贞平 著



中西書局

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第一辑）

唐代宾礼研究

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

王贞平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王贞平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7.6
(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
ISBN 978-7-5475-1251-7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外交礼节—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82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6119 号

唐代宾礼研究

——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

王贞平 著

责任编辑 李碧妍

助理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2 000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251-7 / D·044

定价 60.00 元



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第一辑

Library of Books on Medieval Chinese Scholarly Thought, Vol. 1

主编(Editor in Chief): 童 岭

学术指导委员会(Advisory Board)

(拼音顺序)

从 丛	邓小南	胡晓明
李 浩	刘玉才	刘跃进
陆 扬	莫砺锋	彭 林
平田昌司	徐兴无	张伯伟
周 宪	周勋初	左东岭

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

(拼音顺序)

程苏东	成田健太郎	古胜隆一
顾 涛	李碧妍	林晓光
罗剑波	仇鹿鸣	石立善
孙英刚	孙少华	童 岭
徐建委	永田知之	余 欣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位学术引路人：

蓝德彰（John D. Langlois, Jr.）博士

马丁·科尔卡特（Martin Collcutt）教授

总 序

童 岭

自汉高祖斩蛇起义至朱温代唐，中国的大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汉（国脉约四百年）与唐（国脉约三百年），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帝国，中间夹着的是分裂着的“华丽的暗黑时代”——魏晋南北朝。汉帝国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冲击下开始分崩离析，神州大地继而在南北王朝各自竞争角逐之后的数百年，又重新兴起了隋唐世界帝国。然而，相近的时间范畴内，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第二次的统一，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徒一虚名耳。因此，只有中国的文脉、国脉，在从汉至唐的“中古”时代，经历了凤凰涅槃，重生了伟大的文明之花。

如果笼统来看，Medieval 意义上的“中古”，又与“中世”、“中世纪”相仿。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化主义者眼中，与现代(Modern)相对立的中古、中世纪等词，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常常也过于草率地变成了一个褒贬之词。但是，形塑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毋庸置疑是先秦，而汇集成现代中国甚至东亚世界诸面相之底蕴，亦与中古时代不可分割，勿论是现代口语中的汉语、汉族、唐装、唐人街。迄今为止，中国人心目中做到极致的气节之士，即为东汉党人，郭泰陈蕃是也；中国人心目中做到极致的文艺之士，当在两晋之际，二陆二王是也。斯文在兹，无一不是孕育于绚美而沉静的“中古”。

这种“中古”的精神，也非仅存于禹域之内。如日本东京博物馆四年前公布了新发现的“书圣”王羲之《大报帖》唐摹本，为魏晋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又提供了一大例证；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藏唐太宗昭陵二骏“飒露紫”和“拳毛騧”——那两匹典型的中亚风格的雕像，让人联想起被大食灭国的波斯王室和波斯贵族流亡到唐朝，在长安生活了二百六七十年，他们的中亚式生活方式，又经由大唐，传到海东的新罗、日本……

当然,一个术语的阐释,虽然可以考究当时文化之盈缩与推演,但这一千多年的大文化之全方位解读,却离不开诸多层面的细致考证。从宏观的宇宙到当时个人的心灵世界,从正统的学说到底流的底流。

本套书系之第一辑,拟从章太炎先生“广义文学观”的角度,甄选涵盖学术、思想、经籍、文学、史学等诸领域之著作九种,细目为:鲁惟一(Michael Loewe)《董仲舒:儒家传统与〈春秋繁露〉》、富谷至《汉简语汇考证》、陈鸿森《汉唐经学研究》、佐原康夫《汉代都市机构研究》、何肯(Charles Holcombe)《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文人思想和社会》、柯睿(Paul W. Kroll)《中古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史》、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田安(Anna Shields)《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谊与文学》,以及汇编扶桑经学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

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Iásōn),要从一只锐光炯灼、不眠不睡的毒龙看守下,夺取悬挂在最高橡树枝上的金羊毛。一路上,有美狄亚等人帮助他。同样,在重新审视中国中古学术思想的金羊毛之途上,我们也需要具有“异域之眼”的海内外友人相助。故而本书系作者大多为海外学人之巨擘翘楚,译者、责编等则为国内文史学界的青年才俊。汉代人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为学亦然,唯力行而已。从最年长的年逾九旬的鲁惟一先生到最年轻的译者,也可戏将本书系称为:从90后到90后的力行合作之成果。

道假众缘,在全球范围内基础文史学科遭遇困境的今天,再次感谢诸位学术指导委员、作者、译者、编委与责编们的辛勤付出。现在,让我恭恭敬敬地引用空海入唐求法,得到不空三藏法师所传《秘藏记》的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小序:

云雾弊日月,云雾披而见日月,非日月今更生。

2017年3月11日晨

序 言

本书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考察唐代宾礼。微观考察旨在详细论述唐代宾礼的渊源、意识形态基础,描述其主要礼节,探讨礼仪动作背后的政治寓意,并特别论析宾礼中的口头信息沟通这一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环节。微观考察中论及的礼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宾礼指外国使节(或君主)在抵达唐都近郊时和下榻住所之后,唐廷根据一定的差别规格为他们安排的一系列礼仪活动。这包括郊劳,接受唐帝派遣使节的问候,觐见皇帝,会见唐廷官员,参加宴会、新年及皇帝生辰庆祝集会等,还包括对外国使节逗留首都期间的食宿安排。广义宾礼指外国使节在前往长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参加各种活动之后在归国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员的礼遇。外国使节在参加狭义宾礼活动时,唐廷依据对四邻国家国际地位的评估,指定它们的使者在一定的位置站立或就座,从而在皇帝、朝廷官员及外国使节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距离(或空间秩序)。而在广义宾礼活动中,朝廷则依据上述评估,指令地方官吏为外国使节提供一定规格的食宿安排及交通运输工具。

历史上北亚及东北亚国家、部落的礼仪习俗曾经相互影响、渗透,它们接待外国来使的礼仪有共同或相似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唐代宾礼作比较考察。本书特别强调,中、外宾礼的形式细节虽有类同之处,但相关各方对礼节的政治解读却绝不雷同,并由此而引起了宾礼的“虚名化”,出现了礼仪外在形式与固有的政治含义脱节、分离的现象。为从宏观角度妥善解释唐代宾礼的这一重要变化,本书首先将视线投向域外国家、部落君主自身“权力中心论”的发展,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因,阐明他们对唐代宾礼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然后,本书将唐代宾礼的“虚名化”置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化”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解读,进一步说明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对唐代礼仪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狭义宾礼上,主要的分析概念是“礼仪空间”,但各位学者研究的切入点以及对“礼仪空间”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视不同的礼仪场所为点,在点与点之间形成线和面,这些点、线、面共同构成了礼仪空间^①。有的将着眼点放在仪式场所的政治意义上,认为朝见、宴会地点的演变,反映出唐廷与来使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②,或皇权自身力量的消长^③。笔者在研究中,使用“礼仪空间秩序”这一概念。它专指外交活动中主、客双方之间的水平及垂直距离。具体而言,主(中国皇帝)、客(外国来使)之间的水平距离,表示两者之间政治关系的亲疏。如果有多位来客,他们各自与东道主之间的距离,则表示其所代表的国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外国使节在受到接见时通常站立在宫殿之下的庭院之中,中国皇帝则居于宫殿之中,二者之间有一个“垂直距离”。这个距离是皇帝权威的表现。中国朝廷以这两种距离为手段,在接待外国使节时制造出特定的礼仪空间秩序,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观化、视觉化,并通过调整这两种空间距离,传递一定的国际政治信息。笔者还使用了“礼仪时间顺序”的概念。这是指在一些外交礼仪活动中,常有多个外国使节参加。这时中国朝廷为他们安排的行动先后次序,也是传递外交信息的手段。

依据唐廷宾礼,外国使节在参加礼仪活动时必须以作揖、跪拜、舞蹈、叩头、匍匐伏地等方式行礼,以表达对唐廷盛情接待的感激之情和对唐帝权威的敬畏之心。这些动作是特定的肢体语言,实际上也是主、宾双方传递外交信息的手段,是一种“行为沟通”方式。在唐廷看来,外国使节接受了特定的礼仪安排,按照相应的规定行事,就等于默认了中国对双边关系性质的评估。但是,外国使节有时对某些礼仪安排表示异议,要求修改,乃至拒绝接受。这些举动实质上是他们对唐廷有关双边关系性质的评估提出异议。因此,唐代宾礼中主、客双方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国家行为”,是双方评估各自

①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礼儀空間—皇帝礼儀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1992年第72号,第1—35页。又同氏《円仁の長安—九世紀の中国都城と王権儀礼》,《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2008年第53期,第17—76页。

② 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指出:与唐朝有对等政治关系的国家,唐帝在中朝或外朝接见其使者。来自有君臣关系的国家或“绝域”地区的使者,通常在内朝觐见唐帝。

③ 朱溢《唐至北宋时期宾礼的礼仪空间》,《成大历史学报》2014年第47号,第195—242页。

的国际地位,表达各自的国际意识、世界秩序观,传递外交信息的手段。

唐代宾礼中有“受蕃国使表及币”,这是礼仪活动中传递外交信息的又一重要手段。当代学者对外国致中国历代朝廷国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受原始材料数量所限,这些研究只涉及南海诸国^①、日本、渤海等少数几个国家^②,以及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与日本之间的外交文书往来^③。外国君主既然有来书,则唐廷必有报书。外国君主、使节在中国逗留期间,唐廷还会向他们发布诏书、敕旨、制书。当代学者对这些外交文书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不免给读者留下一种片面印象:在古代外交中,书面信息是主要的沟通手段。其实,外交活动中的问询、奏对、口具、宣敕等口头沟通方式才是传递、搜集信息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在以国书传递信息的场合,使者也经常先以口头向对方通报相关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在传递、搜集外交信息时,口头与书面并重,在某些情况下更偏

① 鈴木中正《南海諸国から南朝の諸帝に送られた国書について》,載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会編《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大安社,1964年,第333—348頁。

② 栗原朋信《日本から隋へ贈った国書》,載氏所編《上代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第175—205頁。同氏《日・隋交渉の一側面》,載其所編《上代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第206—236頁。石井正敏《大宰府および縁海国司の外交文書調査権》,《古代文化》1991年第43卷第10期,第15—23頁。同氏《大宰府と外交文書に関する最近の所説をめぐって》,《日本歴史》1998年第603期,第96—103頁。堀敏一《日本と隋・唐兩國との間に交わされた国書》,載氏著《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私の中国史学(2)》,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第175—201頁。又同氏“The Exchange of Writte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Jap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2(1994), pp. 1—19。韓昇《空海申請過所文書と日本国書》,載氏著《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214頁。

③ 石井正敏《古代東アジアの外交と文書——日本と新羅・渤海の例を中心に》,載荒川正健等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第2卷,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317—338頁。

④ 金子修一《唐代の国際文書形式について》,《史学雑誌》1974年第83期第10号,第29—51頁。同氏《南朝期の上奏文の一形態について》,《東洋文化》1979年第59期,第43—59頁。又同氏“T'a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Acta Asiatica*, 55(1988), pp. 75—101。石井正敏《张九齡作〈勅渤海王大武芸書〉について》,《朝鮮學報》1984年第112期,第65—105頁。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石見清裕《唐の国書授与儀礼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998年第57卷第2期,第37—70頁。笔者对国书问题也有论述,见Wang Zhenping, *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Han-Tang Period*,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39—179。王贞平《汉唐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外交文书》,《唐研究》2010年第16卷,第27—75頁。

重口头沟通的做法。当代学者对这一重要现象,往往着墨不多,或完全没有涉及。

口头沟通对外交信息的传递有着重大的影响。口头信息传递是外交的必要环节,舍此则无外交可言。外国使节以口头传递信息,使他们在东道国有了折冲樽俎的回旋空间,古代外交的运作形式因此而多样化。但是,外交中频繁以口头传递信息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向当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外国使节和东道国涉外官员所传达的口头信息是否扭曲了本国君主的原意?是否与书面信息的内容有所出入?外国使节向东道国以及回国之后向本国朝廷提供的口头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有夸大、失实之处?笔者曾对唐代中日之间口头外交信息沟通问题作过初步探讨^①,本书将以隋、唐时期中国与日本、高句丽、新罗、百济、突厥、吐蕃及南诏等国的关系为例,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揭示外交活动中口头传递、搜集信息的主要环节及其特点,并从这些特点出发,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本书既然以《唐代宾礼研究》为题,对“礼”、“礼制”这两个重要概念就必须有所厘清、阐述、界定,才能比较确切地说明宾礼中具体礼仪安排的含义。西方社会学者一般认为,“礼仪”(ritual)是人们以举手投足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②。也有人认为,礼仪具有矫正行为等社会功能,是文化及权力的表现^③。西方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国上古、中古历史时,多认为礼仪总是与权力密切相连,有强烈的“演示”和“表现”功效,它被用于社会各个层面,以表现、强化权威^④。“礼”的重要功用之一是培养道德观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促使民众默认现存的政权^⑤。有的学者则用“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y)

① 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196—214页。

②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3 (New York, 1968), p. 524.

③ Roy A. Rappaport,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New York, 1999), pp. 169 - 170.

④ Michael Nylan, "Toward an Archeology of Writing: Text, Ritual, and the Culture of Public Displa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475 B. C. E. - 220 C. E.)",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2005), p. 5, p. 8.

⑤ Howard J.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1985), p. 225.

的概念解释礼仪,强调它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工具性”和“有效性”^①。中日学者对礼仪也有类似的解释。他们中有的认为“礼”的第一要义是“皇帝制度下的等级构建”^②;有的认为“礼”指行为规范^③;有的认为“仪礼”与皇权的建立息息相关^④。“礼”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74次,这一高频率表明“礼”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⑤。

但是,唐代宾礼与吉礼、嘉礼、军礼、凶礼互有异同。整体而言,这“五礼”的主旨都是强化唐帝在国内外的政治权威,维护以唐廷为中心的国内、国际政治体制。但是,后“四礼”实施的范围主要在中国,而宾礼则不仅对在唐外国人适用,按照唐廷的理想,它所体现的政治理念,还具有“教化”作用,能影响周边国家的君主、臣民。这种主观愿景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并进一步主张,外交礼仪是中国皇帝用以“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部分”^⑥。有的学者以唐代元日朝贺礼仪为例,认为它体现了“唐王朝的帝国秩序”^⑦。有的更用“天朝礼制体系”概括、分析明清之际中国与朝鲜、琉球、日本的关系^⑧。而更多学者则认为宾礼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体制(即“朝贡体制”)的基石。上述论断自有言之成理之处,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充分将国内礼仪及外交礼仪区分开来;未能

① Jesse Palmer, *Searching for the Law: Emin's Journal as a Key to the Heian Appropriation of Tang Culture*,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9, pp. 34-35.

② 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92页。关于礼制的概要性研究,见胡戟《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成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还可以参考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

④ 尾形勇《中国の即位儀礼》,载井上光貞等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儀礼と国家》,東京:学生社,1982年,第21—48页。

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编《论语数据库》,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198—199页给出的数字是75次。

⑥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1995), pp. 19-21.

⑦ 渡辺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東京:柏書房,1996年,第237页。

⑧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同氏《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将外交礼仪的表象与国际关系的本质、地缘政治的实态区分开来。

典籍中所谓的“制度”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关系体制。“制”为动词，本意为“裁剪”；“度”指程度、限度^①。文献中的“制度”主要指“与数有关的度量衡等事物，包括仪式、器物中各种数的规范”^②。在唐代“宾礼”的具体语境中，“制度”指唐廷依据外国君主、来使的国际地位，确定与其地位相符的礼仪安排。这些安排当然具有现代政治学中“制度”的一些属性。但用“制度”这一概念分析宾礼时应特别注意，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制度，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制裁手段和能力，否则只能称之为“顶层设计”，不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从这一角度考察唐代“宾礼”，不难看到它具有“制度”及“顶层设计”的双重属性。在接待外国来使的特定环境之中，宾礼确实是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强力惩戒拒不接受、违背礼仪安排的来访者的手段和能力。史料中时有唐帝拒绝接待来使，唐廷降低接待规格，乃至关押、囚禁外国使节的记载。但是一旦越出在国内接待外国使节的特定环境，进入国际地缘政治的广阔空间，宾礼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制度”的属性，而仅仅是一种“顶层设计”。其重要功能是以礼仪安排表现“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表达唐廷对双边、多边关系性质的主观看法，与这些关系的实质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有论者已经注意到，将古代亚洲国家之间“礼的关系”的建构与它们之间权力关系的形成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如果“礼的关系”反映各国间的权力关系，“则其中诸礼的意义为何，则有深究的必要”^③。本书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回答是：唐代“宾礼”并不总是如实反映国际关系的实质。它的种种礼仪安排更多地是抽去了实质政治内容，用于向东道国君主致敬，以确保外交活动顺畅进行的手段。当然，唐廷出于宣传“中国中心论”的政治需要，在外交文书、官方记载中总是“在文字上有许多想象性的上下等级区别和包容，但（中国历代君主）实际上十分清楚哪些是实际的教化及政治管辖所及的区域，对其实际的统治有清晰、务实的认识。对‘徼外之国’只求理论上的‘统’不求实际上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三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叶二〇上：“度，法制也（注：《论语》曰：谨权量，审法度。《中庸》曰：非天子不制度）。”同书卷四下，叶四九上：“制，裁也（注：制，裁衣也）。”

②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8—9页。但他认为典籍中的制度“不是今人所言典章、规范之制度”，二者全不相关，似可商榷。

③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65页。

的“治””^①。本书通过对隋唐时期域外一些国家自身的“权力中心论”发展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参与唐廷外交礼仪的相关各方甚至时常达不到在理论上承认“中国中心论”这一所谓的“统”。他们只是对礼仪安排的细节表示“认同”。外交礼仪所表现的“君臣、上下”关系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只限于外国使节来访这一特殊礼仪环境，与双边关系的实质往往有差距。当然这一论断并不否认唐廷在特定时期确实曾与一些国家的君主、部落首领建立过实质性的“君臣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以武力（暴力）为后盾，宾礼只是其表象。《新唐书·北狄传》有“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②的记载，可谓得其真髓。但是，唐王朝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武力为后盾处理对外关系，建立、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制度）只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廷无意或无力以武力惩戒、“夷缚”那些脱轨的外国君主。此时宾礼“中国中心论”的外在礼仪形式与其政治内涵就产生了脱节现象。因此，在探讨唐代对外关系时，要对个案作具体分析，不能被“礼制”、“册封”、“朝贡”的表象所迷惑。一方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宾礼曾真实地反映出一些双边关系的实质。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宾礼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语言，用于表达相关各方对交往性质的主观看法^③。虽然各方对这一语言的某些语汇（具体的礼节）有相似或共同的理解，但对这些语汇所表示的双边关系的性质往往有不同的解读。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古代亚洲各国家、部落以自身为主轴的“权力中心论”。

在亚洲各国独立产生的“权力中心论”曾深刻地影响着各国君主的政治理念，主导着他们的国际行为。它是左右地缘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外国君主对中国宾礼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内在动因。早期的中外交往曾在“宗主—臣属”的政治框架之下进行。各国君主为争取中国政治承认、寻求军事支持，而成为“册封体制”的一员。这些交往以官方往来为主要形式，以“册封”或“朝贡”为媒介，以中国宾礼为礼仪范式。外国君主的最终目的是

①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2页。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叶六一八三。

③ 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kugawa Bakufu* (Princeton, 1984), p. 183.

完善以自身为主轴的“权力中心论”，在国内建立起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他们在达成上述目标后，仍以“册封”、“朝贡”的形式继续与中国皇帝交往。但这些往来不再具有“宗主—臣属”的政治实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遣使，为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文化利益。因此，“权力中心论”在亚洲各国君主间的独立产生，是中国朝廷宾礼从“名实相符”演变为“名实乖离”的外因之一。

唐代宾礼出现形式与内容脱节的另一外因，是当时亚洲国际权力格局的多元化。所谓“多元”是指在亚洲的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多个国家和部族：它们为求生存和发展，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冲突，有时与第三方结盟，有时又各行其是，互不往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各成员均有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力量。权力分布因而呈分散状态，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变量，任何一员（包括唐王朝）都难以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①。唐代亚洲地缘政治因而呈现“多元”及“相互依赖”的特征。

当代学者大多以“册封（朝贡）体制论”为理论框架，解读古代亚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但其成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册封（朝贡）体制论”的立论基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主要依赖宾礼维持运作。本书的研究指出，宾礼所体现的“中国世界秩序”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不仅如此，被一些学者视为“册封（朝贡）体制”意识形态核心的“德”、“义”等观念，也不是唐廷处理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外交语境中的“德”、“义”是“合宜”和“功效”的代名词。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实用功利主义为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改变、调整其对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因此，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册封体制论”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而是从“多节点（多元）”的视角出发，充分注意中、小国家之间以及其与大国的互动，把它们

①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在研究古代中国与游牧部落的经济关系时，使用了“非两极化”的方法。见氏著“*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no. 4（1994），p. 1095。笔者对亚洲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体系也有论述。见 Wang Zhenping, *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 pp. 226 - 228.

之间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多元、形态不断演变的“国际网络”,以期从“多元开放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	1
第二章 宾礼的主要环节	10
一、唐代宾礼探源	10
二、“迎劳”：首都郊外的欢迎仪式	19
三、“赐舍”：外国使团在京城住宿安排	27
四、食料：唐廷对外国使团的膳食供应	32
五、“蕃主奉见”：朝见皇帝之礼	34
六、元日(及冬至)朝贺仪式	41
七、皇帝宴蕃国主、蕃国使	47
第三章 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	59
一、严格与灵活兼而有之的宾礼	59
二、“抗礼”与“争长”	67
三、753年日本使“争长”事件考辨	74
四、作为亚洲外交“公共产品”的唐代宾礼	78
第四章 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	94
一、口头信息传递的历史渊源	94
二、隋末、唐初重大对外交涉中的口头信息沟通	97
三、唐王朝外交活动中“译语”的职能	101
四、日本、朝鲜三国与中国交往中的“译语”	107
五、隋唐地方、朝廷官员与外国访客间的口头信息沟通	111